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在线投稿: <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 84683100 QQ: 486720458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汪曾祺与《高邮县志》

□ 朱延庆

汪曾祺先生在阔别故乡40余年后,于1981年10月10日回到魂牵梦绕的高邮,在家住了30多天。其时,我在高邮师范学校工作。10月13日请先生来校向全体师生作了一场报告,一些在外地工作的校友也赶来聆听。先生的弟弟汪曾庆(海珊)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我又登门拜访了先生。先生回京后,时有联系。

1984年3月,我任高邮县副县长,分管编纂县志的领导工作,具体负责编写总纂的是县志办主任王鹤主任。不久,研究决定,聘请汪曾祺为《高邮县志》编纂顾问。

1986年10月下旬,应江苏文艺出版社邀请,汪曾祺与黄裳、林斤澜夫妇游南京,后到了扬州住小盘谷招待所。先生与我联系,想回高邮拜望任氏娘,看看兄弟姊妹。当时,县志的编纂初稿已成,于是约请先生召开座谈会,对县志的编纂提些指导性意见,电话中先生应允。

10月27日上午,我请县文联驻会副主席陈其昌到扬州去接先生,住县第一招待所。晚餐时,先生情绪很好,他说:1981年回高邮时有些凄凉感,这次变化不小,希望家乡越来越好。席间谈到高邮方言,他认为方言是母语,是一辈子也改不掉的。任何方言都有特殊的表现力,特别的美,譬如“玩”字,本意是弄也、戏也,高邮人却衍生出多种意思。甲帮助乙做了一件事,乙为了表示感谢,一天对甲说:今个晚上请你到我家玩下子。这个“玩”就是吃饭、喝酒。甲和乙从小就是邻居、同学,两个人玩得好。这里的“玩”是相处、交往的意思。高邮人还有“玩意”“玩意头”“玩意账”等用法。我说,《高邮县志》专设“方言”篇目,先生的意见一定认真采纳。

10月28日上午七时,我到先生下榻处客厅恭候,先生仍高卧。前一晚他回去拜望继母任氏娘、看望弟妹,直到夜十二时方才回。亲情浓浓,可感可钦。

七时半,县委召开县级负责人会议,宣布罗一民同志任高邮县委常委、副书记(后来曾任南通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我匆匆赴会。

八时许,我赶到县政协会议室,编写县志的人员、县文联的同志、县政协学习文史委的同志约50人已恭候。我简要介绍先生后,就请先生讲《文学的语言》,时间约1小时,因为九时许,先生要赶到县棉纺厂参加北京、天津等地来的艺术家于淑珍、德德玛、许讲德、刘明源、丁雅贤等与工人的联欢活动。

先生的讲话不用稿,记忆力极好,讲座的内容大致如下:

闻一多先生说:语言似乎是文学的手段、方式,其实是一种目的。

文学的语言同内容是不可剥离的,语言的风格决定了人的气质,作家描写的对象。一个作家可有不同的语言表达,这决定于语言的调子,有的明朗,有的含蓄,有的深沉,有的哀婉……作品的语言可以看出作家的全部文化修养。

韩愈写文章很讲究文气,即文章的气势、气韵(思想、情感)一贯。文气是一个美学概念。气之短长,如身之高矮,只要思想、情感连贯,短长均相宜也。

清代的大书法家包世臣说:写一字,上下左右皆是字也;写一行字,上下、左右相互顾盼,要讲究行气。

桐城派很讲究文气,姚鼐、方苞的文章都洋溢着文气。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语言组织起来,内部联系紧密,就有感人的气韵,褒贬寓于字里行间。

语言的运用要讲究平仄,语言大家赵元任讲,英语的语调一般只有平声、去声,汉语有4个声调。京剧《智取威虎山》有一句唱词:“迎来春天换人间”,“迎来春天”四个字都是平声,唱起来不好听;后来将“天”改为“色”,“色”是仄声,唱起来就好听了。

汉语讲究对仗,这是中国语言的独特美。好的对仗蕴含丰富,声调铿锵,可以增强语言的气势、气韵。

诗化的语言是跨度较大的语言,可以丰富人的想象力。

语言的运用还要讲究意境。



(图注: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在高邮政协会议室召开高邮县志编写座谈会后拍。中为汪曾祺,左为王鹤,右为朱延庆)

因为时间关系,汪曾祺在讲座中没能举较多的实例,似乎意犹未尽,聆听者仍收获颇丰。讲座的题目虽然是《文学的语言》,但对史志编写工作者来说,却有很多的启迪和教育。不论写什么文章,都应该不断提高运用语言的质量和水平,处理好内容与语言的关系,讲究文气,讲究意韵,像写诗一样注重语言的形象、精炼。

意境是一个美学概念。王国维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境界说,汪曾祺先生感悟至深,对于写作者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先生讲座之后,我与县志办主任王鹤主任简要汇报了《高邮县志》的编纂工作,并烦请审阅县志初稿。合影留念。(见图)

九时许,我陪汪曾祺到县棉纺厂参加北京、天津等地的艺术家与工人的联欢活动,高邮的费振钟、王干等众多的文学青年也参加了。先生即席讲话:我们要振兴

繁荣民族艺术,希望大家多来高邮,多吃螃蟹,尤其是高邮的点心、美食,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时许,陈其昌同志送汪曾祺去扬州,然后先生去上海。

11月3日,汪曾祺要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世界上几十位汉学家约请了中国20位小说家谈中国的语言。

汪曾祺19岁离开高邮后,第二次回故乡,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天,而他不忘故乡的编史修志。史志可以起到存史、资政、教化作用,先生对史志工作的重视,对故乡的一片深情,至今仍激励着人们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不息。

1989年《高邮县志》,经江苏省、扬州市评稿组评审通过,于1990年1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新书到手,尽快寄赠先生,其中也有先生的心血啊!

种牛痘的联想

□ 陈其昌

民国初年,高邮文艺周刊《文孟》是杨璧渔(汪曾祺的老师高北溟的老师)先生主办,每期都有大幅广告。此刊一度曾远销南洋。周刊上的广告各式各样,其中包括医学广告,且都是名医。现摘录两则如下:

有一位著名儿科医生,叫朱月桥,早年就在育婴堂向官医赵筱川学习儿科,老师病逝后,乃承其业,专攻痧痘,孜孜以求,遂成名医。其连续的广告是:“欲免天花,须种牛痘,欲种牛痘,须至朱月桥医生处传浆。朱先生为邮地著名良医也。”下面是介绍人杨璧渔、汪铭甫等本地名人。我想,这广告费得朱先生自己出,其他名人抬举他,以壮声威。

另一则广告为许步仙所做。许步仙原籍兴化,移籍高邮,跟乡村医生学医,后自行开业,善治时疫,并非儿科。其广告简单:许步仙先生从农历二月初三开种牛痘,先期挂号,按日传浆。介绍人是杨璧渔、金海平等。

以上所述,引起我的联想。这个曾为人类“第一杀手”的天花病毒,曾夺去全球五亿人的生命,清末民初每年死亡80万同胞,真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天花病毒,殃及人类。此病传染不分国籍,不问民族,也不分男女老幼、贫穷富贵。网载,世界上最古老的病人是公元前几个世纪的埃及国王(后为木乃伊,脸部留有麻子的印记)。及至欧洲流行时(多为空气传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感染后,虽未死去,从此则以假发、纱巾遮丑。倒下的国家元首有法国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俄国彼得大帝二世等。中国从公元一世纪就有天花流行的记载。名医葛洪预言,不医治则多死。时至大清朝,顺治皇帝染上此病后,深居简出,不理朝政,也难免一死。康熙、咸丰、同治虽逃过一劫,却成了“麻皇帝”。

医治天花,协同配合。这是全人类应当共同担负的责任。医治天花,接种牛痘

(最初型),始于中国。史载,宋真宗宰相王旦次子王素感染天花,危在旦夕。有一位峨眉山的神医(无名),将他人的痘痂研成细末灌入王素的鼻腔。如此医治,终使康复。最先到中国学习的俄罗斯医生,将此方法传至其他国家。18世纪有一位英国乡村医生玛纳,沿用原法,仍有百分之二的患者死亡。他吸取教训,专心攻关,研制新型痘苗,效果明显。时至1926年,中国军医齐长庆从一位患病的士兵身上取出痘痂,经过几次从牛到其他生物体的试验,培养出“天坛株”,成为天花的克星。从明清一两金子买一次接种牛痘,到后来种牛痘可以为一般老百姓服务,是个质的飞跃。

举国体制,上下同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的优秀传统。早在瑞金苏维埃政府以及延安时期,党和政府就关心人民健康,以预防为主,利用土方草药,遏制过疫情。全国解放后,百废待兴,

政府仍然坚持人本主义的精神。北京在1949年感染天花者有253人,死亡109人。次年,全面接种,天花在京绝迹。上海比北京迟一年,也绝迹。高邮人民医院开办以前,城里有张厚铨设立的大同医院(靠近土坝口)、张鑫诊所(东大街一带)等医疗机构,张厚铨、张鑫与后来成为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的张廷猷,并称“西医三杰”。他们也负责牛痘的接种。据有关文献记载,人民医院工作一开始就负责牛痘接种。

消灭天花,我们不能忘记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他全面开展爱国卫生防疫活动,卓有成效;也不能忘记工程院院士、医学专家赵德,用鸡胚细胞培养痘苗,成功推广。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